

“四大动员”解危机

——晋绥首府印象记(十二)

□ 牛寨中

1940年,兴县军民赶走了国民党顽固派,建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和兴县抗日民主政府,成为晋西北抗日党、政、军机关的“大本营”。当时,全县驻守的抗日军队、党政机关,人数约4万人。而蒋介石、阎锡山的第二战区,一方面借口抗日救国,拼命搜刮民财;一方面在1940年以后又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军火、军粮、服装、医药的补给。加上日军的经济封锁,使八路军120师和晋西北根据地党政机关的经济财政,几乎陷入绝境。

怎么办?兴县从抗战以来的3年间,人口已由9万余人,一下子减到8万余人,这里又地瘠民贫,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,难呐!而日军也趁晋西北抗日政权立足未稳,于2月23日至4月1日,以13000余兵力分6路对晋西北进行春季“大扫荡”。

面对空前的经济困难、生存困难,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作出坚定的回答:勒紧裤带,团结奋斗,发动民众,共度难关。1940年2月26日,晋西北行政公署向根据地发出紧急号召:开展扩兵、献金、献粮、做军鞋的“四大动员”。兴县县委、县政府广泛开展宣传发动,召开群众会、士绅座谈会,在“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”的原则下,进行动员工作。县委书记景明远亲自到兴县地主、商人最多的黑峪口村召开士绅座谈会,开明士绅刘少白主动带头捐粮50石,银元700元;蔡家崖开明士绅牛友兰在创办兴县农民银行时,就已捐献银元2万3千元,这一次牛老先生又捐粮120石,银元8000元,和自己商店的所有棉花、布匹,解决了晋西北新军决死四纵队203旅18团一个团的服装,并先后把十四、五个子侄送进革命队伍;王家塔开明士绅王作相捐献1780元银元,并把仅有的两条黄河渡船也献了出来;城关开明士绅刘砚章,字训山,民国初年曾任汾阳县知事,八路军120师进驻兴县后,他把自己最好的房屋让给八路军团部居住,并将价值2700元的18条大菜牛慰劳了战士。四大动员中,他还把自己开设的烟坊、酒坊、“豫丰棧”商号里的棉花、布匹所有商品及银元8000余元,捐献给八路军;杨家坡杨老三一次也拿出300多石粮食。一区区委书记马柏树在沟门前村,一次动员张福才拿出800块白洋,30石粮食。

通过“四大动员”,全县两个月

时间捐献粮食2800石、元宝170个、黄金27两、银元57000元、金银首饰230两、法币15万元、各种布匹3600多丈、棉花6万多斤、羊毛5万多斤、军鞋34000双,还有黄油、陈醋等物品。这些资金和物品全部支援了120师和其它抗日部队及晋西北党政机关,解决了燃眉之急。

6月8日,中共中央对晋西北工作发出指示,指出晋西北创建根据地和“四大动员”都获得成绩。9月11日,晋西北行政公署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,林枫致开幕词。会议确定了三大中心工作:健全新政权、开展生产建设、加强教育工作。11月6日,晋西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地委书记会议。会议讨论了关于纠正统战工作中“左”的错误、关于政权工作、财经建设和敌占区工作,并布置了干部训练、锄奸工作和加强伪军工作。

面对“前方战事吃紧、后方兵员短缺”的局面,全县在捐粮捐款的同时,又开展了扩兵动员。动员一开始,便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,比如韩家吉村的牛载丰、牛何芝弟兄,都是兴县中学毕业的学生。兴县革命斗争史记载的二区吕家湾少妇王巧翠,自愿送丈夫赵侯小参军,并将手指咬破,在一块手绢上写下一个“心”字,意思是海枯石烂不变心,安慰丈夫一心一意上前线打鬼子,分别的那天,她一直把丈夫送到蔚汾河的赵家川口村。兴县籍著名作曲家高如星的那首“九九那个艳阳天,十八岁的哥哥来到那小河边……”就是据此写出。这种夫妻分离,无异于生死离别,在那战火纷飞、鬼子疯狂“扫荡”的年代,天天都有抗日将士献出生命,天天都有平民百姓被敌人的飞机炸死,被敌人的刺刀捅死、烧死、放毒熏死,甚至控坑活埋……不少人家、房屋,都葬身于敌人的杀光、烧光、抢光“三光政策”!

为了民族大义,为了保家卫国,让父老乡亲再也不用东躲西藏,兴县儿女纷纷报名上前线杀鬼子,涌现出“母送儿、妻送郎,弟兄扛枪打东洋”的动人情景。仅1940年“四大动员”两三个月,全县动员参军1500人。在8年抗战期间,全县有6500人参军,牺牲474人,加上解放战争时期的3500人,共有10647人参军,牺牲1018人,为抵御日寇、争取民族独立作出巨大牺牲。如今,当我们走进凤凰岭烈士陵园那片庄严肃穆的墓地,眼前不仅是高照的艳阳天,翠绿的松柏树,不仅是黑茶山的巍峨,是永不褪色的火一样的战旗。人们仔细端详着一个个晋绥烈士英名录,细心抚摸着一通通烈士纪念碑,眼前浮现的是英雄儿女舍生忘死,奋勇杀敌的壮烈场面。他们是兴县的精英,是全县30万人民的骄傲和光荣,他们闪闪发光的名字和英雄业绩,谱写了一曲吕梁英雄传。

兴县“四大动员”的抗战工作蓬勃开展后,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慌。1940年,新年刚过,春节尚未到来,吕梁山还是一片冰天雪地,日军集中大量兵力,频频出击围攻,开始了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春季“大扫荡”。

2月中旬,日军调集第九混成旅团、第三混成旅团、109师团共12000多兵力,分别从宁武、静乐、离石三路夹击,直取兴县。当时,120师主力刚从冀中回师晋西北,还未来得及休整,便立即投入反“扫荡”战斗。经过38天的激烈战斗,120师358旅、工卫旅、暂一师、决死四纵队、二纵队,共和日军作战40余次,消灭日伪军1400余人,收复被日军占领的方山、岚县、临县3个县城11个集镇,粉碎了日军的春季“大扫荡”。然而,日军“大扫荡”气焰一次比一次疯狂,一次比一次凶残。

1940年农历11月23日,是一个寒冷而阴郁的早晨。晋西北高原北风呼啸,冰天雪地。此时,兴县城正经受着侵略者残酷的暴行,日军第九混成旅团第18大队从岚县普明中队侵入兴县,从水磨滩到西关口,通惠泉到寿圣寺,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日本鬼子满城乱窜,到处追杀群众:东关火神庙洞口,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被剥光衣服后,用刀刺死;城北紫沟村183个老弱妇孺被日军押到一片空地上,用机枪射死;在西关郭家沟康家大院子里,日军将沿路抓来的70多名群众集中起来,一个个用刺刀捅死。日军惨无人性,竟以杀人取乐,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倒提双腿,在大门口的石墩上活活摔死。

在西崖湾的西庵寺中,日军将抓来的人用枪挑、刀劈、机枪扫射等办法屠杀,就连白发老人、孕妇、婴儿都无一幸免。

县城有一座浅灰色砖墙的洋楼,屋顶上还写用白粉写着一串洋文,插着几面挪威国旗,那是挪威牧师在兴县创办的基督教堂。中午时分,日军

冲进教堂,像牧人赶着绵羊,把牧师逐出去,把男女教友,一个个拉了出来,站到当院。人们跪成行列,两旁立着刺刀和机关枪。几十双哀怜的眼睛,盛满泪水……

农历11月24日上午日军离去时,又在全城纵火焚烧,青砖蓝瓦的兴县城,顿时变成一片火海,上万间房屋,30多座辉煌的明清古建筑,顷刻被烧成一片废墟瓦砾。

腊月初七,鬼子分兵两路,从曹家坡出发,直驱下王家塬和后红月进行“扫荡”。下午4时许,日军到达后红月村,沿路打死七十八个人,用皮鞭棍棒赶回四五十人。腊月初八,日军又兵分三路,到周围各村搜捕,中午陆续返回后红月,又抓获十几个群众。前红月一户人家这天正给儿子办婚礼,听到日军来骚扰,村里人都跑了,从饮马会赶来办喜事的团婆与本村一个老婆婆小脚跑不动,被鬼子用刀劈死。

日军在后红月挨门逐户翻箱倒柜,值钱的东西全部抢走,粮缸水瓮、锅盆碗碟、泥坛瓦罐尽皆打碎,剩余的衣物木器都纵火烧光。日伪军兽性发作,将抓来的中青年妇女拉出来污辱,然后杀死。初九早晨,日军将未杀的47人赶进村中李家院内一个作羊圈用的草房子里,用柴草堵住门窗,泼上汽油,点火焚烧,46人被活活烧死,只有一人逃生。日军在红月村共杀人72人,大部分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。死亡最多的一家7口人,仅留下一个女人和小孩。日军又在全村纵火,烧毁房屋70多人,粮食有三四万斤,宰杀猪30余头、羊120余只、鸡无数,宰杀和抢走大牲畜50余头,抢走财物无从统计。村里人陆续回来时,看到现场惨状,无不泪如雨下。各家把尸首抬回去,哀天恸地,大哭不止。

幸存者会凋零,但历史将永存。2006年,兴县收集日军暴行证据时,在城东郭家岭见到了当年的幸存者刘九儿老人,他回忆:那一天,郭家岭、

日军疯狂『大扫荡』

——晋绥首府印象记(十三)

□ 牛寨中

程家沟83名群众藏在北山梁的一孔土窑洞,被敌人发现,架起机关枪扫射,全部被打死。他当时5岁,还有一个姓白的4岁小姑娘,在横七竖八躺着的死者身下压着,才没有被子弹打中,保住了性命。

我伯父,于1940年农历正月结婚,2月参加八路军120师。1942年5月初,和战友在八分区的交城县敌占区征粮,被日军发现包围于农户院内,因敌众我寡,势单力薄,中弹牺牲,年仅十九岁,当爷爷颤抖着双手接过烫手的烈士证时,怎么也不相信这个事实。而伯母全然不知,天天站在大门口盼望国难早些过去,瞭望丈夫归来。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后,伯父仍未回来,爷爷和奶奶终于确信儿子已战死,婆婆哭着让儿媳改嫁时她才得知这一噩耗。伯父没有子女,留下的仅仅是刻在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英烈墙上的三个字:牛玉业。我曾多次托友人在交城寻找伯父遗骨,终未找到。这些都是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,同时也是兴县抗日军民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付出的鲜血代价。

